

# 王質《詩總聞》研究

李家樹著

## 詩總聞卷六

宋 王質 撰

### 唐風

####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  
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爲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爲  
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  
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爲善也

《詩總聞》道光咸豐間大梁書院刊、王儒行等印同治7年《新鐫經苑》本

史哲學集成  
史哲出版社印行

# 王質《詩總聞》研究

李 家 樹 著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文 史 哲 學 出 版 社 印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質《詩總聞》研究 / 李家樹著.-- 初版.--  
臺北市：文史哲，民 85  
面；公分.--（文史哲學集成；367）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9-026-6（平裝）

1. 詩經 - 評論

831.18

85007802

## 文史哲學集成 ③67

### 王質《詩總聞》研究

著者：李家樹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 彭正雄帳戶

電話：（〇二）三五一一〇二八

定價新臺幣一四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026-6

詩總聞卷六

宋王質 撰

唐風

蟋蟀三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草木之零落恐美  
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爲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爲  
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  
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爲善也

詩總聞原例

聞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詩紐之法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誦誦亦有所助益修見古人之心閉語法有不期而合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為

此訓而為此訓有當為此訓而不為此訓有本無其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四

義強出多端故語意多將失作聞訓二

聞章者凡分設是古為章後為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隨而為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於繁簡短長則其意不附章而生作聞章三

聞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漸為整有以亂為整或其一意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迥令人聞拓以至喉嚨嗟從此得入作聞句四

聞字者凡字義是古字因多通用亦於偏修繁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聲枯不勞更改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已意若純削得宜古今略無差別不見外手他述作聞字五

聞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有三見共同一出即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

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求奇喜新究轉推測其衆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卷四

所共識已所經見者不與作聞物六

聞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有各不同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自出縱不即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聞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亦有

# 王質《詩總聞》研究

## 目 錄

|             |    |
|-------------|----|
| 一、緣起        | 1  |
| 二、成書背景      | 9  |
| 三、體例別出新裁    | 14 |
| 四、《詩》說的重要內容 | 18 |
| 五、“涵泳本文”的啓導 | 26 |
| 六、以人情論《詩》   | 29 |
| 七、《詩總聞》的文學觀 | 32 |
| 八、真正推倒《毛詩序》 | 38 |
| 注釋          | 61 |
| 參考書及論文目錄    | 95 |

## 一、緣起

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經學”與“文學”是對立的。“經學”除了是文字故訓以外，還有着比較深刻的內容，跟政治、道德拉上密切關係，經師們都愛以經說教。至於“文學”，如果擺脫說教的牢籠，就可以恢復它的原來面貌。爲文學下定義，不能用現代西方的文學觀點作標準。以《詩經》爲例，用“三百篇”當諫書，就是經學，重視它的詩歌性質，就是文學。經學的反面是文學，文學的反面是經學，兩者的界限截然劃分。

《詩經》從經學到文學，過程經歷了二千年，主要分爲漢、宋及五四以還三個階段。漢儒爲了使《詩》符

合“經”的地位，無論是古文學派抑或是今文學派，都沒有把詩歌當作文學去研究，反而嚴重歪曲詩篇的原意，用封建道德觀點釋詩，千方百計把《詩》解釋為一種教化的工具。到了宋代，學者企圖衝破漢學的藩籬，他們大都說“國風”乃里巷歌謠，是男女各言其情的詩，很吻合當時社會實際情況。可是，他們又提出“淫詩”之說，根據孔子（公元前551—479）所說的“思無邪”（《論語·為政》）一語，就說詩本身有邪、正，讀《詩》的人不要胡思亂想，對“淫詩”應存着無邪之念，避免給淫詩影響。宋人批評漢儒以《詩》說教，他們何嘗不是墮入了說教的窠臼？直到五四運動（1919）以後，以胡適（1891—1962）、顧頡剛（1893—1980）為首的“疑古學派”才蜂起雲湧地反對舊說，主張揚棄教化觀點，把《詩經》由“五經”的寶座拉下來。他們不滿漢儒以降的“美”、“刺”之說，也不滿宋儒反對漢人不徹底，呼籲要把《詩經》從漢、宋腐儒之手解放出來，掃去層層雲霧，以民間歌謠的角度去探討《詩經》的內容。①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所言，“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②在《詩經》研究方面，當時反對漢學舊說的，以鄭樵（1103—1162）的《詩辨妄》、朱熹（1130—1200）的《詩集傳》和王質（1127—1189）的《詩總聞》最具代表性。

以往不少學者對鄭樵《詩辨妄》（已佚）與朱熹《詩集傳》都曾作過探究、考析，所寫就的專著及論文實在不勝枚舉。關於鄭樵的，以我所知，較著的有顧頡剛的〈鄭樵詩辨妄輯本〉、③阮廷焯的〈鄭樵詩辨妄考輯〉、④于大成的〈鄭樵詩學考〉，⑤等等；關於朱熹的，有潘重規的〈朱子詩序舊說敘錄〉、⑥陳美利的〈朱子詩集傳釋例〉、⑦楊鍾基的《詩集傳舊說輯校》、⑧賴炎元的〈朱熹的詩經學〉、⑨曾伯藩的〈論朱熹對詩經研究的功過〉、⑩莫礪鋒的〈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⑪原新梅的〈朱熹“詩集傳”對“毛詩序”的批判和繼承〉、⑫梁宗華的〈朱熹“詩集傳”對“詩經”研究的貢獻〉，⑬等等。我也

把在港大寫的碩士學位論文〈國風詩序與詩集傳之比較研究〉撮改，於一九七九年出版了《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析》一書，<sup>⑭</sup>並隨後相繼發表〈詩經國風毛序朱傳異同考〉<sup>⑮</sup>及〈試論“鄭風淫”的問題——宋朱熹、呂祖謙“詩經”論學述評〉<sup>⑯</sup>兩文作為補充。王質的《詩總聞》不知爲了何故乏人問津。日本學者村山吉廣（Murayama Yoshihiro，1930—）曾用日文寫過一篇〈王質“詩總聞”考略〉的短文<sup>⑰</sup>，內容空洞，只屬於書介性質，沒多大的參考價值。一九八八年，黃忠慎出版《南宋三家詩經學》，<sup>⑱</sup>把程大昌（1123—1195）的《詩論》跟鄭、朱的著作相提並論：“本書僅論南宋鄭、程、朱三家，說《詩》咸能獨抒己見，或掙脫毛鄭之說，或直探詩人本旨，雖其謬誤不能免，然精闢之見更是疊見層出。”<sup>⑲</sup>這是黃氏個人的選擇理由，但學者們棄王質的《詩總聞》不顧，持的又是怎樣的理由？一時沒法深究。程大昌的《詩論》，僅得一卷，雖也反對舊說，如以二《南》與《雅》、《頌》並列，又謂《南》、《雅》、《頌》爲樂詩，諸國之《風》爲徒詩，卻從沒批駁《詩序》之說，而且撰文暢論《詩序》

決不可廢，<sup>②⑩</sup>跟南宋當代去《序》言詩的風氣是南轅北轍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說王質的《詩總聞》“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sup>②⑪</sup>“二家”，指鄭、朱；如果批評的當，以《詩論》取代《詩總聞》，相信難以令人接受。

我曾經發表過一篇以〈王質“詩總聞”初探〉爲題的文章，透過通盤檢查《詩總聞》的內容，探討王質說《詩》的觀點和方法。<sup>②②</sup>我特別指出：真正推倒《毛詩序》的，在南宋是鄭樵和王質。朱熹所謂攻《序》，口頭上非常猛烈，見諸書面又是另一回事；就十五《國風》而言，《詩集傳》跟從《詩序》的幾達百分之七十。鄭樵的著作不傳，沒法窺其全貌。<sup>②③</sup>王質去《序》言詩，考訂毛、鄭之失以及反對漢人以經說教的傳統，立場堅定，始終如一。他的《詩總聞》除《豳風》外，其他《國風》拋棄《序》說的，印象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二《雅》的例子也不少。《詩集傳》在攻《序》方面與之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sup>②④</sup>

王質的《詩總聞》在宋代甚至是整個“詩經學”的歷史上是一本被忽略和被低估了的《詩經》專著。我這篇論文的重點，是為《詩總聞》在歷代“詩經學”史上的地位，提供一個比較公平的定讞。在探討王質說《詩》的觀點和方法之餘，我察覺到《詩總聞》的二十卷的篇幅，其實包涵了豐富的內容，有許多更是跳出了前人舊說所囿的。例如作者還按照人的感情來分析詩的具體內容，就值得仔細研究。如果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王質以人情論《詩》，是初步自覺地用文學眼光來研究《詩經》。因此，我又發表一篇以〈王質“詩總聞”的文學觀〉為題的文章，再次檢閱《詩總聞》的內容，從王質“以人情論《詩》”說起，看看他怎樣由此啓導了用文學眼光來研究《詩經》的傾向，並嘗試把《詩總聞》裏所揭櫫的文學觀呈現出來。<sup>②⑤</sup>

這本小書是在上述兩文的基礎上擴充、補述、總結而寫成的。一九九〇年我出版《詩經的歷史公案》一書（由臺北大安出版社印行），考查了漢、宋及五四以還三個階段“詩經學”的內容和發展的趨向。在考查漢、

宋三個時期“詩經學”的同時，我發覺在過去二千多年的嬗遞演變中，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詩經》專著，各各有自己不同的《詩》說，在每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裏，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傳統的、屬於主流的，自然受到重視，至於非傳統的、在主流以外的，雖也曾作過貢獻，卻備受忽略。對於歷代許許多多的《詩經》專著，我都很感興趣，以宋朱熹《詩集傳》為例，我就曾做過深入的研究；特別是那些備受忽略的著作，更能挑起我研究的興味。既然備受忽略，那就正好說明在《詩經》研究的範圍裏存在着一塊從沒開墾過的處女地。一九九四年，我再出版《傳統以外的詩經學》（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印行），收錄〈王質“詩總聞”初探〉一文，以王質《詩總聞》作為研究個案之一。本書把王質《詩總聞》獨立處理，無非是想更詳細地探討王質說《詩》的觀點和方法，以及更深入地考察他的《詩》說在歷代“詩經學”中佔的是什麼位置。一本被忽略和被低估了的著作，是值得研究者多花功夫、多費筆墨將它的內容真相

和歷史地位揭示出來的，這也是促使我出版我有關《詩經》研究的第四本專著的原因。

## 二、成書背景

王質，字景文，號雪山，其先鄆州（治今山東東平）人，徙居興國（今屬江西）。早游太學，與九江王阮（？——1208）齊名。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曾為張浚（1097—1164）幕僚，入為太學正。上疏請孝宗（1163—1189在位）早定和戰守之策，忌之者斥為異論，罷去。虞允文（1110—1174）宣撫州、陝，辟質同行。後歷敕令所刪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等職。允文當國，推薦王質任右正言，卻為權宦所阻，因而奉祠山居，絕祿不仕。<sup>②⑥</sup>據《宋史》本傳，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sup>②⑦</sup>王阮《雪山集·原序》說：“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

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間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曆，千載日至，毫無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頰有味。”<sup>⑳</sup>文章、氣節俱見重於世。著有《詩總聞》、《紹陶錄》、《雪山集》。

自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孔穎達（574—648）《毛詩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取士皆依此考試，<sup>㉑</sup>唐代以還的學者都不敢輕議毛、鄭的得失，對於《毛詩序》也是照樣跟從了。<sup>㉒</sup>但是，到了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情況就有了改變，學者喜歡拋棄歷史包袱，而另外創立新的學說，這種棄舊立新的精神漸漸形成了一種時尚。<sup>㉓</sup>慶曆以後這種立新精神，是宋代學者對漢、唐箋注千百年來訓詁名物的孜孜以求感到厭倦而激發出來的。<sup>㉔</sup>漢代章句訓詁之學，後期逐漸發展成為凝固的狀態，隋、唐的義疏雖然虛實繁簡未必完全相同，立場和古文經並無差異，所以宋代自闢蹊徑，不再墨守前人傳注。特別是唐代有了佛經的雕版以後，到五代，刻了《九經》和《文選》等書，北宋時又刻了



《十五史》和諸子等書，學者得書方便，見多識廣，更易比較研究；同時受了禪宗“呵佛罵祖”的影響，敢對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和著作懷疑，結果宋代的疑古運動蓬勃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sup>③③</sup>

《詩經》方面，率先攻擊舊說的，有歐陽修（1007—1072）、蘇轍（1039—1112）二人。歐陽修的《毛詩本義》“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sup>③④</sup>而蘇轍的《詩集傳》“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sup>③⑤</sup>所以仍然沒有跳出毛、鄭範圍。到了南宋諸儒，如鄭樵、王質、朱熹，才開始正式提出激烈的言論。黃震（1213—1280）《黃氏日鈔》卷4〈讀毛詩〉說：

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sup>③⑥</sup>